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
2003年12月，頁299~329

BIBLID1012-8514(2003)32p.299-329
2003.2.10收稿，2003.10.13通過刊登

§研究討論§

十六世紀的朝鮮族譜*

常　建　華**

提　要

本文依據現存十六世紀朝鮮的族譜序跋等資料，對當時的朝鮮族譜形態進行了考察。認為十六世紀較之上一個世紀在編撰思想、體例內容等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修譜的政治性在加強，蘇洵的修譜看法仍受重視，但也開始引用張載等宋儒的主張，更全面地把握宋儒的宗族理論；從編撰過程來看，顯示出從家牒到八寸譜以至更大規模族譜的趨勢；十六世紀族譜內容豐富以及體例完善當數嘉靖《文化柳氏世譜》，該世紀還產生了譜學家鄭昆壽；十六世紀的族譜還是內外譜，但是十六世紀晚期族譜受父系宗法觀念的影響，世系記載發生了重要變化；十六世紀發生的壬辰之亂，既嚴重毀壞了原有的族譜，又刺激了宗族重新修譜。

關鍵詞：十六世紀　朝鮮族譜　譜序　修譜思想　族譜編纂

* 本文是作者「朝鮮族譜研究」課題系列成果之一，該課題係「2001~2002年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國際學術交流支援項目」，在此特向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表示衷心感謝！也要感謝兩位匿名論文評議人對拙文提出的建議。

**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歷史學院教授。

一、前言
二、族譜的功能
三、族譜的修纂
四、族譜的內容和書例
五、族譜的普及性與刊刻問題
六、結語

一、前言

朝鮮族譜研究取得的最顯著學術成果是從社會史視角進行的，[1]而且多從數百年的較長歷史時期觀察族譜的變化。這樣的研究難免有些大而化之，而且對文化史有所忽略。我的思路是從分析不同世紀的族譜資料入手，探討朝鮮族譜演變，將朝鮮族譜研究更加細致化，力求把握不同世紀朝鮮族譜編纂的特點，進而勾畫出其發展軌跡。研究的重點則放在中國以族譜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與朝鮮族譜學的關係、族譜文獻學方面，主要探討族譜的功能、族譜的編纂、族譜的內容與書例、宗族與編修族譜的關係等問題。[2]

現存最早的朝鮮族譜文獻是十五世紀的，數量少而且比較簡略，反映出草創時期族譜的特點。至十六世紀朝鮮族譜得到長足發展，透過當時的族譜編纂活動，我們可以更深入認識朝鮮的早期族譜形態，得以瞭解中國文化在朝鮮的傳播以及朝鮮社會的接受程度，瞭解到朝鮮社會的

1 體現在以金斗憲，《韓國家族制度研究》（漢城：漢城大學出版部，1969）、崔在錫，《韓國家族制度史研究》（漢城：一志社，1983）、宋俊浩，《朝鮮社會史研究》（漢城：一潮閣，1987）為代表的論著中。

2 關於中國族譜學對於朝鮮的影響，參見白惇仁，〈東亞諸邦的姓氏之學與族譜之學〉，收入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主編，《第一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臺北：聯經，1984）；陳捷先，〈略論中國族譜學對韓日琉越漢文族譜的影響〉，收入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主編，《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經，1987）等有所論述。

變動。文化柳氏嘉靖譜（1562）是韓國現存刊刻時間第二早的族譜，研究者們對其已有不少探討。流傳下來的其他十六世紀譜序資料還有一些，並沒有集中進行分析。鄭炳浣先生所編大型資料集《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一書，搜集了大量譜序，是重要資料集。其中收錄十六世紀十四個宗族的譜序十五篇，我們以此為基本資料並結合朝鮮文集與族譜，就十六世紀的朝鮮族譜問題進行專門探討。除了《韓國族譜舊譜序集》的資料之外，我又增加了朴氏族譜序、青松沈氏的三篇族譜序跋以及《文化柳氏世譜》（嘉靖版）等資料一併討論。上述朝鮮族譜資料涉及的族姓有和順崔氏、豐川盧氏、坡平尹氏、鎮川宋氏、泰仁許氏、順興安氏、昌原丁氏、沃川全氏、文化柳氏、興城張氏、河南程氏、青松沈氏、陰城朴氏、安東金氏、茂長金氏、恩津宋氏、光山卓氏共十七個。

二、族譜的功能

十六世紀朝鮮譜序作者基本上是所序宗族內外後孫中的士大夫，作為族人，他們瞭解本族以及修譜情況；作為士大夫，則宣揚自己的一些思想。一般來說，當時人們多把修譜作為人的基本要求，如同水有源、木有本，人是祖先所傳，自然不能忘本，修譜可以滿足人們尋根和感念祖先的情感需求，反映了祖先崇拜的觀念。如崔世演作於明正德十二年（1517，中宗十二年）的〈和順崔氏譜跋〉說：「吾姓為湖南人也，結源於斯，分派於斯，綿綿不絕，以至於今……余嘗聞源深之水其流必長，根固之木其枝必茂。若然，則因其源之深、根之固，而其派枝之盛且長，斷可知矣……余於源深流長、根固枝茂之說深有感焉。」[4]作者以源深流長、根固枝茂之喻論述宗族昌盛不衰的原因。再如坡平尹氏作於朝鮮中宗三十四年（1539）的〈己亥譜序〉，[5]這是一篇請外姓著名學者所

3 鄭炳浣編著，《韓國族譜舊譜序集》（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87）。

4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7~38。

5 蘇世讓，《陽谷先生文集．書尹氏族譜後》，卷 14 亦有該序，載韓國文集編纂委員員

作的序，序中說：

> 木之根厚者枝葉必茂，水之源深者流派必遠，人有積慶，然後其流風遺澤至於數世而不絕，此理之必然者也。……尹監司溉，坡之白眉也，茲余省母于金馬，即珥節來訪，仍出宗姓譜一卷以示，仍請題其後。余惟古之聖賢不繫于世類尚矣，然三代以下，莫不詳於族譜之傳。吾東人尤重於是，而一再傳後不至於泯滅者鮮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言人善惡之澤，皆不過五世絕，豈有一世二世至於百世而不絕者乎！若坡平之尹氏者，自高麗初殆將數十世而簪紳相望，益大以繁，譬猶根厚之木，源深之水，枝葉之茂，流派之遠，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宜為厘為卷軸，刻諸金石，以壽其傳，而使世家巨族取以為矜式，不為驕溢之行，務培積善之地，則是譜者豈獨一門之所為寶藏，實為輔世之一助也。吁，盛矣哉！

作者大提學蘇世讓以水木之喻，說明世族形成的原因在於「積慶」。作者認為坡平尹氏為首屈一指的顯赫氏族，所修族譜有利於保持大族的昌盛不衰。進而建議「世家巨族取以為矜式」，「務培積善之地」，認為尹氏譜「實為輔世之一助」。又如《昌原丁氏晚幹派譜》載有丁熿作於明嘉靖三十年（1551，朝鮮明宗六年）的舊譜序，指出本族修譜的原因：

> 今夫水浩浩其歸而晝夜不舍者，源之流也；今夫木鬱鬱其翠而生意無窮者，根之發也。奔千里之遠而不知其所出，木秀參天之久而不知其所自萌，則其於為水為木雖不足為之加損，而豈不有乖夫原始返終之理耶。而人戴天履地，中立為三，而靈且貴乎。庶類以眇然之體，天下之物，無得與之競焉。或者自以為智窮天人，識博古今，而問其姓之所由生也，則其能推父而上連其系至於十世者蓋鮮聞

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第 382 冊，220~222；文集本與族譜本文字有異，重要者如文集本中的「姓譜」，族譜本作「宗姓譜」；文集本中的「數百世」，族譜本作「數十世」，茲依族譜本錄出。又，鄭炳浣先生書中〈舊譜序目錄〉以該序作於中宗十年（1515），不過中宗十年為乙亥，中宗時期的己亥是三十四年（1539），茲從譜序。

矣；甚者自身不及高曾之人，間或見之。則是水之無源而流，木之無根而發也。寧不反於理欠於事者耶，此譜之所由作也。[6]

丁熿亦以水源木本之喻，說明「原始返終之理」，鑒於鮮聞人們「能推父而上連其系至於十世者」、甚至「自身不及高曾之人」，強調人必須修譜。還有嘉善大夫行尚州牧使全彭齡作於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明宗九年）的沃川全氏譜序，也認為：「根深而末茂，源遠而流長，物故然矣，在人何異？凡人積德於先世者，厚則余慶之，及於後者遠矣。」[7]作者亦以水木之喻說明積德先世澤及後代的道理。由上可見，水木之喻是譜序中經常出現的，用來說明以修譜尊祖敬宗與記錄氏族的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譜序反映出修譜的政治性與士大夫對於族譜的需要都在加強。這時孝道被提倡，李恒〈和順崔氏譜序〉提出：「孝友之人無譜而有譜也，圻族之人有譜而無譜也。」[8]表彰崔氏修譜者直長公崔世演的孝友精神，以倡導崔氏子孫仿效。另外，盧禛作於明嘉靖十五年（1536，朝鮮中宗三十一年）〈豐川盧氏族譜序〉說作者得到了本族的舊譜，「其所錄雖不能歷數其世系，而於族旅之分，根枝之蔓，則記之頗詳。異日某親與某親相遇於百里之外者，因此可以知其初實分於一人之體，而其終乃若是也，其必相親相愛之篤而孝感之心足可長也。於是遂請假手，旋遍見諸兄，因謄錄如右……其並我為兄弟者，後我為子孫者，庶因此而有所考，其曰某屬之親，某宗之裔云爾者，則必相篤愛之，毋或疏且忘哉。」[9]豐川盧氏盧禛所作族譜的目的在於增進瞭解本族世系，加強族人的往來與感情，即解決歸屬感的問題；而「孝感之心足可長」的說法表明也要發揮孝道的作用。

修譜以弘揚孝道，表達人的尋根意識，與中國的思想文化不無關係，中國譜學的直接影響也是存在的。青松沈氏嘉靖乙巳（1545）譜序：

族之有譜，古也，周之宗法、漢之世表是已。……竊思夫有父子、

6 鄭炳浣編著，《韓國族譜舊譜序集》，51。

7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56。

8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6。

9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9~40。

> 有兄弟，為叔侄，為堂從，始親而終疏，自近而漸，遠同異姓，於是乎分焉。此雖理勢之使然，而其於隆殺之間不能無憾焉者也。如欲其指點分明，考余派於一了之中，則莫若圖譜之為切也。[10]

可見以「圖譜」考派系的作法受到儒家倫理的影響，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周之宗法、漢之世表」，即來源於中國的譜學。興城張氏大同譜載張倪[11]作於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宗二十一年）舊序，也反映出譜序作者受到中國譜學的影響很深，譜序說：

> 族之有譜尚矣，周之宗法，漢之世表是已……竊思夫有父子、有兄弟、為叔侄、為堂從，始親而終疏，自近而漸遠，此雖理勢之使然，而其於降殺之間，不得無憾焉者也。始欲指點分明，考余派於一了之中，則莫若圖譜之為切也。嗚呼！同是譜者咸知一本之萬舛，千指之一脈，追遠返本，以擴其親親之道，則疇敢以服窮情盡忽視如途人也哉。況乎虞史貲堯之德，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睦族之義、報本之道，其不大乎。同吾子孫者，知祖先之有善行，觀感而興起，則後裔之無窮如天地同流矣。譜中之人須悉勉勵，幸甚幸甚。[12]

該序的前面部分文字與青松沈氏嘉靖乙巳（1545）譜序相同而晚出，可能張序參考了沈序，或者有共同的來源。不管怎樣，這一現象說明當時朝鮮人熱衷學習中國文化，為修譜尋找理論依據。張倪還以「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為經典，追求睦族、報本。並服膺蘇洵（1009~1066）「服窮情盡忽視如途人」之說，通過修譜期望子孫興起，改變百餘年未有出仕者的遺憾，振興宗族。還有宗族將修譜同中國宋以後移風易俗的思想聯繫起來，文化柳氏嘉靖譜柳灡的跋文記載：

> 竊觀夫今世之人，雖號為厚門巨室，尚不記高玄之名字者比比有之，況乃親盡服盡而至於雲祁之遠者乎！是何秉彝之天終有所泯滅

10 《青松沈氏族譜》（第四回己丑譜，蒙學文化社，1978年影印本），卷首。

11 按：該序未具作者姓名，鄭炳浣先生〈舊譜序目錄〉序文著者作「後孫」，據漢城大學校圖書館編，《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合目錄》（漢城：漢城大學校圖書館，1981）記載，張倪作序，見330。

12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57~58。

> 而然耶，實以其無家乘相傳耳。是以家君憤世俗之弊，篤追孝之誠，銳意修譜，廣采博訪，隨聞隨錄，功既訖，釐為若干卷，其間雖有甲乙之舛錯，豕亥之誤訛，亦可謂譜之大成者也。
>
> 惟我東國公卿士大夫之先祖後裔暨我王后妃嬪之世系，靡不俱載，則是豈特柳氏之私譜也歟，其曰通國之公譜也，亦不謬矣。觀是譜者，不但曰某也乃某也之先，某也乃某也之後而已矣，一開卷如對祖先之面目，天所賦之良心悠然呈露於念念之間，而遠慕追敦之意自不能已已焉。則譜之有補於世教也，豈不偉歟。況功業節義、文章道德之可師可法者磊落相望，然後之人聞其風而有聳慕興起，有得於師法服膺之際，而進進於光先耀後之域焉。則其于作成人才之益，豈小哉！是誠我一家世守之青氈也，其傳於無窮也固也。嗚呼，其盛矣乎！[13]

跋文指出，《文化柳氏世譜》由於廣采博訪，是當時「譜之大成者」。由於該譜記載了朝鮮「公卿士大夫之先祖後裔暨我王后妃嬪之世系」，因此不僅是「柳氏之私譜」，而且是「通國之公譜」。並認為可以使天賦良心產生「遠慕追敦之意」，而有補於「世教」。〈文化柳氏萬曆戊寅譜序〉說該譜：「使覽之者足以興孝悌之心，起敦睦之風」，前面提到蘇世讓認為尹氏譜「實為輔世之一助」，「世教」、「輔世」的說法表明，當時已將族譜提高到教化的高度來認識。[14]

---

13 《文化柳氏世譜》（文化柳氏宗親會發行，景仁文化社1979年影印嘉靖本，國立漢城大學圖書館藏）。

14 修譜崇本以維持世教是中國明清時期重要的宗族思想，如宋濂明確指出，修譜以維護長幼尊卑秩序是有輔「世教」。洪武三年（1370）他在《陳氏家乘．序》中說：「嘗謂譜者，名家巨族之綱領也。凡冠婚喪祭，別長幼，定尊卑，雖子孫至於萬葉，秩然有分以相守，燦然有倫以相接者，皆有賴於譜者。古者大宗小宗之法明，故其子孫雖至百世，循循有序，未之或亂。自後世民不興行，宗法因之以廢。是故巨族之家，其世次多不相識，昭穆多不相辨，忻戚不相關，而慶吊不相及，恩義判隔若秦人之與越人焉。噫！木同一源也，而其後乃如此，可歎也哉！是故，宗法後廢，惟有譜牒之興為可以維持世教也。」見龔劍鋒等，〈宋濂詩文拾遺（一）〉，《文獻》1993年第1期（北京）；並請參考常建華，〈試論宋濂的宗族思想〉，見《東洋學研究》（1998，

蘇洵提倡的修譜看法在十五世紀就受到重視，十六世紀仍是如此，但這時張載等宋儒的主張也被引用，朝鮮人注意更全面地把握宋儒的宗族理論。例如，李恒為和順崔氏譜所作序，要求崔氏族人「視祖免猶骨肉，視途人猶同胞」，[15]引用了蘇洵的「途人說」。鎮川宋氏族人宋西郊的譜序開宗明義：「譜生油然孝悌之心者，著於眉山之譜也。承古人皆重之意而錄及常山之姓者，出於成文公之話也。油然一念，台獨睞耶，古人所重，台獨輕耶云」。[16]強調他重視修譜是受到了蘇洵讀譜油然生孝悌之心說法的影響。《順興安氏世譜》所載通訓大夫坡州牧使楊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安瑋作於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明宗元年）譜序說：

> 氏族有譜尚矣，無譜無以知祖先之所自出，子孫寖以乖隔，或不識緦麻之親，視同路人，不待親盡服盡而後疏且遠也。我順興安氏家傳孝友，世守詩禮，圭組蟬聯，將三百年於茲，而譜未修焉……嗚呼，一人之身而兄弟，兄弟而至於服盡者勢之無可奈何，聖人亦不得已制為禮法，服雖可盡而情不可盡也。其不可盡者，不與可盡者同盡，則子孫之觀此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必能思先人之德業，期不敢失墜，又將知某為某之後，於我為叔侄，若兄弟之行，不見而情已親，既見而心益厚，雖百世之遠，雲祁之眾，怡怡然若一家，豈至於路人而同視也哉。是足以篤恩誼而厚倫理，興孝悌而成禮讓，此監司與諸君所惓惓也。凡為子孫其勖之。[17]

〈順興安氏譜序〉以蘇洵「途人說」的修譜理論作為自己譜序的中心思想。昌原丁氏先祖事跡由於缺乏文獻記載，世系不很清楚，該譜的編修

漢城），第4輯。把族譜功能用「世教」即教化世俗表述，以維護宗法制廢後的社會秩序，這在宋濂之前尚未發現，它是張載：「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之說的發展。見《張載集．宗法》（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1，258。

15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5。

16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41。

17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46~50。

在先祖方面用力頗多。譜序作者丁熿說道：

> 或又曰蘇氏族譜略遠祖而為一人之分為兄弟，兄弟至於路人而作也。今特詳於祖先者，豈不戾於古歟？曰老泉之譜重乎敦族，今吾之譜重乎追遠，追遠則民作於孝，敦族則民興於悌，孝悌之道行，而民之德厚矣。今吾之族同祖乎吾先，吾之祖同視乎吾族，則追乎遠者，乃所以敦乎族也；敦乎族者，豈獨不追乎遠也？況乎詳乎先代及後支者，非吾譜乎？追遠之誠，敦族之義，庶乎其兼之於是耳。[18]

他擔心有人以其「追遠」不合蘇洵「敦族」之意而置疑，指出敦族與追遠並不矛盾，其修譜是二者兼而有之。看得出蘇洵修譜理論在當時的朝鮮社會影響比較普遍。

宋以後新修族譜濫觴於歐陽修、蘇洵，十五、六世紀的朝鮮人注意引用蘇洵的修譜主張，不過宋以後修譜只是復興的新宗族制度的一部分，就思想史上對宋以後新宗族形態的影響來說，張載、程頤、朱熹等人的主張影響更大。這些思想家是從整個宗族制度的重建考慮問題的。其中張載（1020~1077）是宋代思想家中最早提出復興譜學與宗法的，他的名篇〈宗法〉指出：

>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
>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致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19]

18 丁熿，《遊軒先生文集. 昌原丁氏族譜序》（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573冊），卷3，221~225。

19 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1，258~259。

張載從維護國家的社會秩序出發，提出修譜等措施，並與政治聯繫起來。柳希潛作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譜序開篇就說：「程夫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須是明譜系。然則譜系之明豈不關於尊祖重本之義耶？同源分流，人易世疏，詠于陶詩；情見於親，親見於服，發於蘇引，余於是有感焉。」[20]《文化柳氏世譜．嘉靖序》擇要引用了張載這段話，說明作者對於修譜理論有了新的理解，認識到修譜的政治作用以及與宗法的關係。應該說這是一種變化，我們發現此後的譜序引用張載這段話的越來越多，而文化柳氏嘉靖譜序最早，其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柳希潛的譜序在朝鮮譜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它更完整地借鑒了中國宋儒的修譜思想。也有可能後世譜序作者還受到了《文化柳氏嘉．靖譜序》的影響。不過作者張冠李戴，誤將張載的話說成是程頤的，這也是應該指出的。〈青松沈氏嘉靖乙巳譜序〉是這樣結尾的：

> 嗚呼，同是譜者咸知一本之萬殊，千梢之一脈，推源反本，以擴親親之道，則疇敢以服窮情盡而忽視如途人也哉。庶見人篤孝順之心，士尚敦睦之行，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周禮．大司徒》賓興亦行之教，將復行於當世矣。是以俾風化之一資云爾。
>
> 時嘉靖乙巳季夏初吉後裔通訓大夫行順天都護府使順天鎮兵馬僉節制使兼監牧通源書於升平館[21]

除了不要「服窮情盡而忽視如途人」的蘇洵譜論外，強調了親親之道要「自身而家、自家而國」，正是宋儒強調的修齊治平思想，這在以前的朝鮮族譜中還沒有看到過。「以俾風化」的政治性在該序強化了。此後，光山卓氏外孫鄭昆壽作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宣祖三十三年），譜序開頭論述修譜的意義：「噫，人之明於譜者，盡所以收宗族而厚風俗，立忠義而益朝廷。凡譜於斯者，盍各追念前烈，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也。」[22]重申張載收宗族而厚風俗、立忠義而益朝廷的主張，以及蘇洵修譜使族人

20《文化柳氏世譜》。

21《青松沈氏族譜．青松沈氏族譜序》，卷首，己丑本（1649）第四回影印本，1987。

22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69。

「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的說法。修譜與政治關係的認識十分明顯。

三、族譜的修纂

從族譜編纂過程看，十六世紀的朝鮮修譜顯示出從家牒到八寸譜以至更大規模族譜的趨勢，族譜的規模擴大，內容更加豐富。

我們首先來看十六世紀修譜所依據的資料。〈和順崔氏譜序〉說：

> 余觀崔氏之譜，出於和順，移於金山，蔓延於國中。自始祖參議公歷豐基公凡五世，世生羽儀朝著，公卿縉紳，五屬十連，可謂盛矣。其官爵姓名，載在國乘，則譜之有無似不關也。而豐基公之胄直長（原文小字注：世演）公，惟懼其遠而忘、疏而廢也，訪諸族老，搜之家牒，分源別派，為崔氏家譜。余嘗按服紀有五等，親有九等，九等之後則無服，無服則途人也。途人則憂樂之不相吊慶，婚娶之必相混褻，自然之勢也，則直長公之譜可無作乎。[23]

「崔氏家譜」的修撰基於「訪諸族老，搜之家牒」，將調查與文獻結合起來，其中「家牒」是重要的文字資料。新修譜以達到不忘遠、「分源別派」、防止族人為途人的目的，「家牒」發展為「家譜」。豐川盧氏的盧禛所作族譜，來源於族人「參奉公在世時所自錄成」的盧氏世系，然後「而又繼之以金與鄭之姓」。[24]〈順興安氏譜序〉說：

> 我順興安氏家傳孝友，世守詩禮，圭組蟬聯，將三百年於茲，而譜未修焉。舍弟玹勤搜博訪，手自撰錄。後得族兄縣監珽氏所撰譜牒，將刊行，而丙午春按節嶺南。宣化之餘，邀生員承宗並集其所藏舊牒及他譜，使掌證訛，因囑安東府使成公謹募工入梓，二君皆安氏內外孫也。[25]

該譜由安玹先自撰錄，後得族兄縣監珽氏所撰譜牒，又邀生員承宗並集

23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4~35。

24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9、40。

25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46。

其所藏舊牒及他譜，使掌證訛。但是由於「先祖以上家牒不傳，不能盡記」，可以看出，「舊牒及他譜」是修譜重要的文獻基礎。《尚質張氏譜》是因「偶得高麗列傳於冠山鄭侄之家，乃得其宗派之所自」，[26]主要依據高麗傳記以及「求諸遠近書」作成。

反映朝鮮修譜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演變的典型事例是文化柳氏。該族永樂二十一年（1423）修譜後，又於嘉靖年間再次修成並刊刻族譜。今存嘉靖版《文化柳氏世譜》[27]序跋完整，我們據此進行討論。嘉靖版的《文化柳氏世譜》不僅在修譜思想上有所發展，而且整部族譜更加完善。該譜分為十卷，記載二十三代族人，規模較之以前的族譜為大。族譜內容也充實了，開篇為〈永樂序〉，接著是〈凡例〉十二條，然後是〈目錄〉，全譜以千字文為序排列，下面繫行狀，收錄族中先祖的行狀、墓誌等傳記資料，再下是主體部分的世系圖，圖後為柳希潛〈嘉靖二十一年跋〉和〈嘉靖四十一年序〉，序跋之間有署名柳洵的自警詩與署名柳子的題書，最後以捐獻刊譜費者名單收尾。

我們先看柳希潛所作跋文：

> 文之有柳久矣，始顯于麗初，代為卿相，其以文章政事、忠孝清白、誅除權臣、功存社稷著名於世者，不可一二數，事跡考諸史斑斑可見。以及昭代，衣冠簪履，布列朝著，繼繼綿綿，不失家業，以迄於今，垂七百歲，此豈非祖先積善之餘慶乎！吁，亦盛矣哉！然而世無家乘，雖高曾之名號尚有不能記考者，子孫浸以乖隔，仁睦之道掃池而盡矣，何待服盡親盡而後疏且遠哉。余未嘗不興歎於斯，欲修譜系者蓋亦有年矣。歲辛丑謹以家傳小牒質諸忠義衛權公諶所藏權文正公溥子孫族圖，更加廣采博訪，補闕正訛，釐為圖譜若干卷，然不可家到戶問，其間不能無子女次序之舛錯、前後室產之誤施，後之同志者（下兩字不清楚）而筆削（下三字不清楚）。
>
> 嘉靖紀元之二十一年壬寅孟冬有日大丞十九代孫朝散大夫行南部

26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57。

27 一九七九年影印本，文化柳氏宗親會發行，景仁文化社印刷；國立漢城大學圖書館藏。

主簿希潛謹跋[28]

跋中說權諶藏有「權溥子孫族圖」，權溥是安東權氏著名先祖，可見文化柳氏嘉靖譜參考了安東權氏的族譜，不過我們還不瞭解「權文正公溥子孫族圖」是安東權氏那一種族譜。文化柳氏舊有「家傳小牒」，柳希潛以此在嘉靖二十年（1541）即辛丑年與權諶藏有權溥子孫族圖對照，又加上採訪，轉年修成「圖譜」。在柳希潛看來，「家傳小牒」尚稱不上是「圖譜」。

再看柳希潛作於嘉靖四十一年的〈譜序〉所說：

> 歲壬寅始修世譜，廣采博訪，以著年代，而尚多闕漏。尋遷驄馬，繼授義興，困於叢簿，亦未卒事。乙巳之秋，坐門禍配於聞韶。謫居蕭索，伴愁無物，日對譜圖，專意證正，而羈繫一隅，無從質問，間有往來使賓公牒守宰，或相過焉。語必及於譜，知其為某之孫也。則因以求正其系派，至於十八年之久，問一證二，舉五知十，補漏者多而譜已成矣。噫！吾東方巨家大族，內外門系，無非大丞之遠派，則子子孫孫顯揚於朝列者，亦莫非大丞之餘蔭也。修是譜而明是系，豈特吾門之幸，實朝廷管攝天下人心之一大本也。柳承旨渾、柳參議潛，聞是譜之撰欲鋟梓印播，以壽其傳。而柳相智善適尹東都，相囑互議，謀諸鄭方伯彥慤將欲分刊，而遭甲寅之荒，亦未遑也。余懼夫十年之志，終為覆瓿之具，而卒不得傳也。手自楷書，已成二本：一送柳參議，以為他日繡梓之地；一藏弊笥，以為我子孫之傳也。鄭相宗榮，是我從妹婿也，觀風南道，亦以紙筆求一本，余不憚謄寫之勞而操筆益勤者，期於廣傳而不至泯沒也。嗚呼，蘇老泉云：觀吾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愚不知看此譜者，獨無是心之發也耶。
>
>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下浣謫人希潛書于聞韶寓舍[29]

從該序可知，嘉靖二十一年（1542）所修的壬寅譜是文化柳氏「始修世

28 《文化柳氏世譜》，496頁上。

29 《文化柳氏世譜》，496頁下。

譜」，不提永樂譜事，說明所謂永樂譜可能非常簡單，不值得一提。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季，即「乙巳之秋」柳希潛遭發配，此後得以專心譜事，歷十八年終於在嘉靖四十一年修成完善的族譜。其間曾試圖刊刻，嘉靖三十三年（1554）甲寅遭受災荒而放棄，於是為了流傳該譜，八年間手寫兩本，抄錄篇幅十卷的族譜是十分不易的。

柳希潛序文後有其子柳瀜的跋文，該跋的開頭部分我們在前面論述族譜功能時已經錄出，跋文接著指出：

> 前於歲在癸卯，家君作宰龜城，內外八寸之譜，則刻於其邑，以壽其傳。而至於是譜也，則編帙浩繁，功未就緒，而適丁外艱，繼被門禍，戴罪南荒廿一年於茲矣！千里謫中，衣食之奉取資未遑，則奚暇念及於此乎。鄭相國彥慤之觀風南道也，柳相國智善適尹東都，相囑互議，將欲開刊，而遭甲寅之不稔事，且未（下一字不清楚）也。今方伯李相國亦大丞公外裔也，承命南來，綜理之隙，便閱是譜，孝悌之心不能自已，以為不可使已成之譜湮沒而無傳。遂走書于湖南南宮相國、湖西柳相國，則右二相國亦留意於此者，得書而喜，決計繡梓。而繡梓之資無所於取焉，則一皆令諸大丞公之內外後裔，在三道典專城之任鎮方面之位者，不論其寸數之親疏，族派之遠近，各出供饋之費，隨其郡縣之肥瘠而輕重焉，聞風而樂赴者不知其幾人矣。於是鳩集刻工，開刊于聞韶，月再閱而厥功告成焉。[30]

跋中關於刊刻族譜的記載很重要，使我們瞭解到癸卯歲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柳希潛已經刊刻「內外八寸之譜」，那麼這個八寸譜，我認為就是壬寅譜。理由是辛丑（嘉靖二十年）年開始修的譜依據「家傳小牒」，轉年修成，應當是內容比較簡單的小的譜，現存的壬寅年柳希潛跋文就是附於該譜的。這個譜的規模與完善程度遠不能同歷時十數年完成於嘉靖四十一年的譜相比。嘉靖四十一年譜的刊刻（刊刻時間為嘉靖四十四

30 《文化柳氏世譜》，497頁上。

年，1565）充分顯示了文化柳氏士大夫的力量和外家的支援，[31]結合譜後的捐助刊譜名單來看，在慶尚監司李友閔、全羅道監司南宮忱、忠清道監司柳潛率領下，該三道任官者一百九十一名出了刻印世譜的費用。之所以如此勞師動眾是因為該譜規模大，費用多，不像柳氏的八寸譜，由柳希潛獨自完成。這樣看來，文化柳氏嘉靖譜與更早的安東權氏成化譜，這些多少借助官府刊刻的較大規模族譜，主要原因是解決刻印費用問題，除了這兩部數一數二的族譜外，當時還有「內外八寸之譜」被刊行。

文化柳氏嘉靖譜與安東權氏成化譜一樣，作為現存最早的刊行族譜，受學者的重視，一般是利用譜系資料進行研究，對於譜序的分析則言而未盡。我們考察後認為，文化柳氏修譜經歷了從「家傳小牒」到「內外八寸之譜」再到更大族譜三個階段；文化柳氏世譜在修譜思想上有所發展，注意更完整理解宋儒復興宗族制度的主張，把修譜作為進行「世教」看待，而且整部族譜更加完善。文化柳氏永樂二十一年修譜後，又於嘉靖年間再次修成並刊刻族譜。不過這時以嘉靖二十一年所修的壬寅譜作為文化柳氏「始修世譜」，不提永樂譜事，說明所謂永樂譜可能非常簡單，不值得一提。文化柳氏舊有「家傳小牒」，柳希潛以此在嘉靖二十年即辛丑年與權諶藏有權溥子孫族圖對照，又加上採訪，轉年修成「圖譜」。在柳希潛看來，「家傳小牒」尚稱不上是「圖譜」。嘉靖二十二年柳希潛已經刊刻「內外八寸之譜」的壬寅譜，後來進一步重修。

青松沈氏十六世紀的修譜活動也比較典型。今存一六四九年出版的《青松沈氏族譜》（第四回己丑譜），卷首為〈青松沈氏族譜序〉收錄了青松沈氏在十六世紀前三次修譜的序跋，內容比較豐富，值得分析。先看〈嘉靖乙巳譜序〉：

> ……今方伯沈公光彥氏巡臨敝府，招通源若曰：吾門閥世閥不為不盛，而其於撰述家乘蓋闕如也。吾先君有志未就，而手草遺存，思

31 宋俊浩先生指出，嘉靖譜的刊行過程說明當時「非常重視經由婚姻而成立的相互關係的社會傳統」。見氏著，〈從氏族制度和族譜來看中韓兩國之傳統社會〉，《第三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臺北：聯經，1987），348。

> 欲繼述焉，慨念於懷久矣。幸今吾與子違會此，遣僚佐柳君泗亦為沈氏之表侄，天其或者蓋亦有待於今日乎，子其勉之。遂以草譜與之，於是詳究本支，補闕證訛，同姓則雖庶孽而不遺，異姓則計世代而略節，似無餘蘊而然，于祖先之生某，甲娶某氏，歷仕高下，享壽長短，慮或泯沒而難尋，故並附行狀、碑銘於譜後，以寓夫羹牆之思焉。遂鳩工繡梓，期永其傳。
>
> ……時嘉靖乙巳季夏初吉後裔通訓大夫行順天都護府使順天鎮兵馬僉節制使兼監牧通源書於升平館[32]

嘉靖乙巳即嘉靖二十四年（1545）沈通源任職於順天府，於此刊刻了本族族譜。該譜原有草譜，經外家的表侄柳泗補闕證訛而成。由於收錄同姓與異姓，也屬於內外譜。該譜「並附行狀、碑銘於譜後」，構成了傳記部分。再據〈嘉靖壬戌譜跋〉可知，沈銓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續修並刊行了族譜，刊譜主要是利用舊板並加續刻。族譜內容除了世系增續外，又補錄了三篇碑文。與前次相同，仍是刻印於官府，不過這回是在全州府。再看〈萬曆戊寅譜序〉：

> 惟我沈系粵自麗代，勳勩著聞。逮本朝傳德襲訓，寔繁昌盛……而譜牒之傳，尚無成書，豈非病歟。歲嘉靖乙巳，吾宗丈參贊胡安公，按節湖南，從祖父領樞公制綿升平，慨然於茲，相與合謀，乃因家乘，查考公譜，肇成我沈氏族譜。且錄先代碑文、行狀於後，刊印行世。使覽之者足以興孝悌之心，起敦睦之風，二公之功不其韙歟。年記寢遠，生息漸盛，添祿增修，在所當急，而事功之成，必得期會，府尹公之續纂於萬府，亦豈偶哉。余以無似襲前休，躋顯仕常，以德不類為懼，乃於丁丑秋祗荷寵命，分憂南服，道之珍原，適參贊公表孫李君景溫為邑宰，青城伯之裔世居珍原者亦多其麗，則斯譜之重修亦一天興之，幾而不可共為者也，遂使李君掌其事，書字……該子孫後裔之守領於茲道者甚夥，咸出錢以助其費用不貲，公切易辦集，我先祖嗣續之繁，吾宗人追遠之篤，益可驗矣。板本

32 《青松沈氏族譜》（第四回己丑譜），卷首。

> 始藏於順天，末移于全州，珍原之族合辭請曰：「茲孫視順與全雖小，吾儕之於是本也。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當以死守之，不亦愈於在彼乎。」余曰：「誠哉是言。」遂藏諸珍原。噫，斯譜也，兩相創之於前，自乙巳十有八年，壬戌府尹公續修於後，至今十七稔，兩增續氣，又值于余，豈多於前，切要以繼述為幸，至若雲礽之盛，爵位之崇，彌遠彌彰，所以增光，實源於祖先積善之慶，忠孝之報。籲其至哉。聊以告吾宗之君子于無窮云。
>
> 皇明萬曆紀元之六年戊寅仲秋望後二日後孫嘉善大夫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青陽君義謙敬書于羅州錦城館[33]

萬曆六年（1578）沈氏再次續譜，仍是在舊板基礎上增修，補充新增人口。刻印族譜的費用是在全羅道的官員「咸出錢以助其費用不貲」而完成的。

綜上所述，青松沈氏在十六世紀連續三次修譜並刊刻，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乙巳譜「乃因家乘，查考公譜」而成，譜名為「族譜」。這是在朝鮮最早發現使用「族譜」，由於是在「家乘」基礎上修成，應當是譜牒編纂進入新的層次。修譜思想不僅記錄世系，更強調修身齊家治國的道理。除了收錄範圍擴大外，重要的變化還有就是增加了行狀、碑銘等傳記資料。十八年後沈氏續修族譜，又隔十七年再次續修，這樣短時間不斷續修，說明沈氏對於修譜的重視以及十六世紀晚期譜學的發展。

〈青松沈氏世系行跡〉記載：

> 我沈氏之族譜，高祖父議政公通源首刊於順天府，其後觀察使公銓暨我王（下四字不清楚）府君相繼增修，板本在湖南，值丁酉倭變而見失，世遂無其傳矣。幸舍弟校理熙世性耽而聞博，諸譜牒亦皆詗得無遺，欲著海東氏族之志，有志未就而早逝，獨手正吾譜，至王考行而止。余常恐久而泯滅，適宰榮川，鋟之梓焉。且先世碑誌固宜盡刊，而文夥力弱，有未悉焉。謹采國乘與碑誌，錄其梗概，

33 《青松沈氏族譜》（第四回己丑譜），卷首。

以附於卷首，著吾先而不及旁親者，以吾非作者也。吾宗諸君子各欲著其先懿，則盍於焉而繫之也歟。

己丑季冬上浣後孫通訓大夫榮川郡守長世再拜謹書[34]

己丑年為一六四九年（朝鮮仁祖二十七年），該序說前此三次修譜的譜板均毀於戰亂。此譜是四修，為了傳世而刊印。據說該譜經過了有志纂修海東氏族志的序作者之弟訂正，質量應當較高。己丑譜為卷上、卷下，卷前冠以〈青松沈氏族譜序〉收錄舊序跋三篇，之後是〈青松沈氏世系行跡〉，小序實為己丑譜新修序言，世系收錄十一世，實際上是世傳。換言之，該譜由譜序、世系行跡、譜圖構成。由此我們多少可以窺見青松沈氏十六世紀所修族譜的面貌。

十六世紀朝鮮族譜的卷數在增加。坡平尹氏所修族譜為「宗姓譜」，一卷。順興安氏該族「分為三大族」，於是「譜凡三卷，文成公子孫為第一，檢校公子孫為第二，及第公子孫為第三。」[35]至文化柳氏達到十卷的規模。

四、族譜的內容和書例

族譜內容的增加主要體現在傳記資料上。《和順崔氏族譜》之後孫崔世演的跋文記載：「余之祖善門，亦以清儉為工曹判書，有五荊樹，先君其長也。遺詩千有餘篇，今略選三十三首，並附其末，欲賴此以傳不朽。」[36]該譜附有三十三首祖先的遺詩，這是以前族譜罕見的。青松沈氏譜萬曆六年譜序說此前沈氏所刊族譜「並附行狀、碑銘於譜後」，構成了傳記部分。《文化柳氏世譜．行狀》收錄族中先祖的行狀、墓誌等傳記資料。

族譜內容豐富以及體例完善可以嘉靖版的《文化柳氏世譜》為代

34 《青松沈氏族譜．第四回己丑譜》。

35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48。

36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7。

表，該譜分為十卷，記載二十三代族人，全譜可以分成序跋、凡例、目錄、行狀、世系、先人遺筆（推斷其意既作為先祖訓語也是保留先人書法）、捐獻刊譜費者名單六個部分。

這時的族譜還是內外譜。如豐川盧氏譜，來源於族人的盧氏世系，然後「而又繼之以金與鄭之姓」，說明所修族譜應當是包括同姓族人和異姓姻親的內外譜。根據前引〈青松沈氏嘉靖譜序〉記載可知，青松沈氏原有草譜，經外家的表侄柳泗補闕證訛而成，由於收錄同姓與異姓，也屬於內外譜。今存嘉靖《文化柳氏世譜》也是包括「內外門系」的。

現存十六世紀的朝鮮族譜只有文化柳氏嘉靖譜，我們對於其他族譜的內容所知不多，由宋謏壽作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宣祖三十二年）的譜序，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譜序，因記載了已經毀於壬辰戰火的恩津宋氏《本宗恩津世譜》的基本情況，可瞭解到十六世紀朝鮮族譜的基本形態。該序內容如下：

> 余頃在漢師嘗撰《本宗恩津世譜》，柏谷鄭相公昆壽過余，因見謂曰：「凡人之宗，高祖、外高祖暨內外曾祖母之父、祖母之祖父、祖母之外祖父、外祖母之祖父及外祖父，是八高祖也。撰錄八祖之系派，即八寸譜也。如欲一展閱而盡究源委，盍修而為之譜乎。」余感其說，遍訪都中，搜得諸大家世譜六十餘卷，窮搜博考，無有餘蘊。惟我八祖之根枝，了然如視諸掌，又參質于友族輩，多得其詳，首尾十四年，始為就緒。凡為內外從兄弟再從三從之類，八百餘人，若大父叔侄孫之屬，不可勝數。遂並本宗世譜，手寫一編，昕夕寓目，親愛之良心自不覺其油然，不亦韙也。不幸變起，倉卒泯沒於兵燹之中，惜哉！余漂泊窮村，與死為鄰，罕與人接，又譜牒無可徵，雖欲𠎤為撰輯得乎！追思舊譜，如鴻踏雪，徒費浩歎而已。今于清燕之暇，只究得本宗始末，領其大略，且據宗兄圭庵先生所錄世系，參以聞見，錄其梗概如左，其于敬宗睦族之道，未必無少補爾。

萬曆己亥長至月下澣後裔栂壽敬識[37]

《本宗恩津世譜》由宋謏壽所作，歷時十四年，大約成書於十六世紀七八十年代，收錄族人八百餘人，範圍是「八祖之根枝」，包括「內外從兄弟再從三從之類」，是一部「八寸譜」。該序引用鄭昆壽（1538~1602）的說法：「凡人之宗」是「八高祖」，「撰錄八祖之系派，即八寸譜」反映出當時朝鮮人對於祖宗的一般認識，因此「八寸譜」[38]是當時一般人修譜的基本形式。「八高祖」大致相當於中國五服的親屬範圍，但它是雙系的，即包括內外祖先。中國的五服也包括女性，不過女性是作為丈夫附屬出現的，而朝鮮則是基本上具有並列的地位，這一區別是明顯的。

該序反映出當時首都的大族一般都修有世譜，序作者就看到六十餘卷，數量可觀。事實上由於朝鮮世譜內外祖先都記載，而外祖一般不會集中在一個姓氏，必然造成數姓之間為了修譜而交換譜系資料，當修譜成為一般社會風氣時，族譜便無保密可言，互相參考世譜就會成為自然。這是與中國不同的，中國是父系男方一方的譜系，修譜時沒有必要參考外系譜系，加上為了防止別人偽冒，一般不交換族譜，族譜密不示人成為習俗。

戰爭是族譜遭到破壞的重要原因，壬辰之亂就是「宋氏世譜倉卒泯沒於兵燹之中」，作者所序之譜只是後來重新修的簡譜而已。

現存十六世紀的唯一族譜〈凡例〉，是嘉靖《文化柳氏世譜》中柳希潛所作，也可以說這是朝鮮族譜第一個正式的「凡例」。這篇〈凡例〉在朝鮮族譜學上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妨照錄如下：

---

37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66~67。

38 朝鮮還有「八高祖圖」的說法，〈靈光金氏八高祖圖舊譜序〉記載：「先為八高祖圖，自吾父母至於內外八姓鼻祖，窮探極披，其生某年，娶某氏，住某地，仕某朝，卒某日，葬其地，各註其旁，自吾高祖起頭，為橫看八間，內外並列，其子若孫，迄于己行而止。」載《韓國族譜舊譜序集》，946。又宋俊浩，〈韓國家系記錄的歷史及其解釋〉一文探討過八高祖圖，主要依據的資料是金國良、黃胤錫的八高祖圖，見《歷史學報》（1980，漢城）87輯。

一、自始祖至於今代數多，故五折而書；

一、書千字文于張頭者，相准子女之歸處也；

一、主上及王后三圈，其並書徽號於極行；

一、後宮二圈，其並書某宗後宮於極行，而其未知某宗後宮，則只書後宮于其井；

一、作婿者有本宗見於譜中，則其子女不可所存，故歸之于本宗之下；

一、子女皆書見某字者，便考覽也；

一、作婿者雖本宗，見出於譜中，未知其詳，則其子女姑書見在之井，以俟知者；

一、改嫁者直書前後夫之名而不諱者，十目所視，不可掩也，亦可以為戒；

一、當代功臣之後，應為忠義衛，而或不書忠義者，刪煩冗也；

一、吾觀諸譜，或父子倒施，或子婿相為父子，比比有之，皆緣傳聞之誤，此譜亦非家到而戶聞，亦豈無此弊乎，知者所正可也；

一、文簡以下各世行狀獨詳於希潛之直派者，譜之撰修在於希潛之手也；

一、文僖公柳洵文化之柳，文定公柳順汀晉州之柳，而皆大丞之裔，其子孫請刻其行狀，故並錄焉。

從族譜書法的角度看，〈凡例〉體現了朝鮮族譜有別於中國的特色。如「五折而書」，實際上是每頁紙劃五道線分為六行記載世系；每頁紙取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中的一字用大字順序印在第一格，因為醒目，而且便於檢索；世系不僅男女並書，而且記載女婿；改嫁者直書前後夫之名而不諱，不過當時已覺不妥，加上了因「不可掩」而「亦可以為戒」的道德評價。

〈昌原丁氏譜序〉討論了譜例，確定了一些書寫原則。譜序記載：

> 梯穀云：或曰凡書名以著代也，副承以上，名上必冠以諱字，其下或諱或不諱者，何也？名上冠諱字不敢直名之也，乃尊之之辭也；或諱或不諱，尊吾之所自出而尊不可貳之也。其諱上加後字或加子字，何以異也？自彼至此，其為子為孫不能詳知，而考其時世，其間相去甚遠，而其代之相承有甚促者，則世譜只憑口而傳之，不無代之有脫漏，是不可以子書，亦不可以孫書，加之以後字不得已也；若其為子于父也，無疑則遂子之耳。譜為丁氏作也，而吾之祖吾之父暨吾之兄，獨與先祖其娶、其仕、其行、享年幾、某日卒葬某地得書焉也，而他不及者，法乎古也，譜乃吾作也。[39]

該譜規定李朝初期的祖先副承公以前先祖「名上必冠以諱字，其下或諱或不諱」。名上冠諱字表示尊敬；或諱或不諱，尊所自出之意。再如其諱上加後字或加子字，是因為世譜只憑口而傳之，不無代有脫漏的現象，不能確知子孫傳承關係，不得已加以「後」字；若知父子關係的，無疑標明為「子」。還有，作者的祖、父暨兄，獨與先祖其娶、其仕、其行、享年幾、某日卒葬某地記載詳細，而他人不及，是取法古法，「譜乃吾作也」。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世紀晚期，族譜受父系宗法觀念的影響，世系記載發生了重要變化。《安東金氏世譜》載〈庚辰譜序〉，係金億齡作於明萬曆八年（1580，宣祖十三年），內容如下：

> 吾金氏自新羅敬順王之後，世為卿相，至上洛公，功名事業彪炳琅鏘，載在高麗史。入我朝，源遠流長，益熾以昌，為三韓世家之冠。雖然年代既遠，枝派互分，多不能繼先人之業。而亦有流落鄉村僅同編戶不自知為上洛之後者，況能辨世系之所自來乎。同宗有識之士，未嘗不慨恨於斯，或有私編譜錄以遺子孫者，而不免有疏脫舛訛之病。己卯年間，金公鋧留意修正，以為一家之藏，亦未及刊行。今江華府使金公鋘，自為忠清道節度使時，另加校正，購工刊出，而詳於同姓以重祖，而略其外孫以尊宗。然後吾金氏世代之久近，

39 丁熿，《遊軒先生文集．昌原丁氏族譜序》（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573冊），卷3，224~225。

> 枝派之條達，族黨之親疏，子孫之多寡，明若觀火，如指諸掌。自今以往，常目在之，溯派而窮源，由親而及疏，知其為一氣之所分，而以篤親愛之義，則此譜之修，豈直為吾金氏之幸也，抑我國家親親化行之一大驗也。
>
> 萬曆八年孟夏裔孫通政大夫承政院左丞旨兼修撰官知制教億齡謹序[40]

該序很值得注意，它反映出該譜受父系宗法觀念的影響，世襲記載發生了重要變化。作者作為通政大夫承政院左丞旨兼修撰官知制教這樣地位較高的文官，說所修族譜「詳於同姓」，「而略其外孫」以表達「尊宗」、「重祖」的思想。與此相關，序中還表達了將修族譜作為政治統治的手段，即修譜不僅「以篤親愛」而且也是「國家親親化行」的驗證。序中也反映了金氏修譜的歷程，從「或有私編譜錄」到「留意修正」，進而「另加校正，購工刊出」，不斷修改，直至剞劂。

十六世紀修譜比較嚴謹，注意譜系的真實性問題。〈沃川全氏譜序〉作者就指出，「譜中所錄世系、名字、職秩或出於傳聞，頗有錯誤，為子孫者當詳核而改正之」。[41]要求子孫訂正該譜出於傳聞的錯誤記載。

五、族譜的普及性與刊刻問題

十六世紀的朝鮮，產生了譜學家鄭昆壽（1538~1602），主要生活年代在宣祖朝（1568~1608），即十六世紀。《沃川陸氏大同譜》所載舊序說：「嘗聞我朝宣廟時宰臣鄭昆壽能通古今巨族諸譜，故人以不為鄭知為恥。……鄭公以氏族之學有名於世，又數賂東使赴京之便，必求大國之人來居東國者之先系，詳書於氏族大全。」[42]十七世紀的《豐基秦氏舊草譜．後敘》記載：「嘗聞西川君鄭昆壽相公，於東國名家族系無不洞

40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61。

41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56。

42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793。

知。」[43]〈鳳城琴氏舊序〉也講：「時有西川君鄭昆壽，癖於聚觀名族之譜。」[44]足以說明鄭昆壽是當時有名的譜學家，據說他編輯《氏族大全》並搜集的眾多族譜，只可惜失傳，不過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宋謏壽作於一五九九年譜序保存的鄭昆壽關於八寸譜的珍貴論述，看到《光山卓氏族譜》中他於一六〇〇年所作譜序。這兩篇譜序反映出他對於朝鮮修譜的深入瞭解以及中國修譜理論比較全面的認識。另外，鄭昆壽的文集存世，收錄了他為本族譜牒所寫的三篇序言，〈清州鄭氏家乘序〉記錄了他修譜的經過：他自弱冠就有志於修譜，參考了家中舊譜、世家記、家傳、內外戶口、賜牌小錄、年譜、職牒、契卷等各種文獻，「為纂相承世次，又敘歷世府君仕宦終始、卒葬年壽以及夫人、內外氏族，至於子孫曾玄、男女次第、名位婚嫁，一一備錄，目之為家乘。其為書不惟國史家牒彙粹已悉，如官府所藏、私篋所密，凡文籍紀述之可憑以為據者，旁搜博訪，靡隱不賾，靡微不探，首尾三十有餘年，參互考證，庶幾為成書，而不幸稿未及脫，遇壬辰之變，並先世遺像而俱不得保。」[45]可見他修譜參考了非常多的文獻，歷時持久而多方考證，只可惜原稿未能保全。家乘以外，鄭氏還修有族譜圖，記載分派、世次。[46]文集所附行狀說他：「尤長於姓氏譜牒，京鄉士族歷世、名字、出處、事跡無不該洽。人或問其世系來歷，則必一一歷數而詳說之，必曰：子之先起於某，歷某某，幾代顯，幾代不仕，如身親目見，而言之者莫不愕然驚歎而悅服。嘗欲編次東方氏族之書，使為人子孫者各有所考證焉。而晚年居閑，旁無書寫，亦未有子弟輩為之贊成之者，舊家世族咸以為不幸焉。」[47]

關於十六世紀朝鮮修譜的一般情況。朴光玉（1526~1593）於一五七七年（萬曆五年）為本族作〈族譜序〉，內容如下：

朴之得姓始于新羅之太祖，其後世派分散處不知其幾族，而吾東方

43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138。

44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159。

45 鄭昆壽，《栢谷先生文集》（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21冊），卷1，89。

46 鄭昆壽，〈西原鄭氏譜圖序〉，《栢谷先生文集》，卷1，91~92。

47 鄭昆壽，《栢谷先生文集》，卷4，398。

> 文獻不足，譜牒無稽，又不知其皆出於赫居世否也。陰城之朴實祖於高麗閭門祗侯，祗侯以前則無所考矣。嘗閱視家藏舊文，得元至正年中安集別監所署奴婢公案，乃斜分故尚書某及尹政丞者也。其所謂尚書，則祗侯公是而政丞尹不書其名，又不書其族派，然既與尚書同其財，則其為屬籍亦必不疏矣。嗚呼！當時閥閱之顯有如是，而年代未久，後嗣子孫無有能記之者，自祗侯公以下，乃載家譜；或意祗侯公始籍于陰城，而別為一族，今所載乃家廟之所宗祀也。吾少時嘗見家譜一冊，亦自祗侯公以下，而中間不謹藏致失焉。今之譜乃嘉靖癸卯年間外孫有觀察嶺南者得於民間，比諸少時所見，又甚疏略矣。頃者南來宗人之居漢城者，出其所錄，參諸嶺南所得，略為修正，俾入木圖。其廣布數年來，勤加補刊，又雜取諸家族牒以證之，始克成圖。猶恐闕漏、尚多冒偽相雜簡，于漢城求其廣訪詳正，而又慮曠庶時日或未遂共願，則乃鳩功捐俸，亟鋟諸板，期以功訖，移藏於光州雲裏洞祭堂之側。嗚呼！自祗侯公以訖於今，而幾三百年矣。外生雖繁，宗人甚少，庶出旁派之得姓者，亦皆參錄重家之意也。嗚呼！譜之廢久矣，今之成亦費偶然，後之覽者豈得不思其然而求其敦睦矣哉。
>
> 大明萬曆五年龍集丁丑十一月己未後裔朝奉大夫行雲峰縣監南原鎮兵馬節制都尉兼春秋館記事官光玉謹序[48]

該序反映出陰城朴氏始修族譜，在此之前，只有簡單的「家譜」。本次修族譜，參考了「諸家族牒」，看來當時社會上有牒之類家譜的比較多，而修族譜者相對少些。該族譜的刊印是「鳩功捐俸」而成，表現出依靠官僚的屬性。該族的祭祖場所值得注意，不僅有「家廟」，而且光州雲裏洞還有「祭堂」，重視祭祖。

《鎮川宋氏世譜》所載〈辛丑譜序〉作於明嘉靖二十年（1541，中宗三十六年），作者宋西郊在序中稱：「偶拜桂原君得舊藏一本，而宋萬頃宅又有一本，參奉宋君志修輯也。宋判閣、宋別提宅亦各有舊譜云。

48 朴光玉，《懷齋先生文集》（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456冊），卷2，162~165。

而旁支後生皆未備錄也。予於是粗草以備參互考證，加書、改書，不一書之資云。」[49]宋西郊所修族譜參考了不少舊譜，有其父所撰「外譜支派」，還有桂原君、宋萬頃宅、宋判閣、宋別提宅計舊譜四本，說明十六世紀四十年代民間有一定數量的族譜存在。宋西郊所修族譜應當也是內譜與外譜結合的形式。

前引資料中宋西郊所修族譜參考了四本舊譜。陰城朴氏修族譜參考了「諸家族牒」、恩津宋氏譜序作者看到六十餘卷族譜，可見當時朝鮮纂修族譜有一定的普遍性。坡平尹氏〈己亥譜序〉說：「三代以下莫不詳於族譜之傳，吾東人尤重於是，而一再傳後不至於泯滅者鮮矣。」[50]我想所說朝鮮人尤重於族譜之傳，是指重視世系，但是由於編修正式的族譜畢竟有限，所以才「一再傳後」而多「泯滅」。豐川盧氏在盧禛看來，中國「雖陋商賤隸尚有系譜」，卿士之裔自不待言，是一個普及家譜的國家。強調應當學習中國，編撰族譜。

《河南程氏華東統宗系圖》載〈正宗世系譜序〉，程宗孟作於明隆慶六年（1572，宣祖五年）。內容如下：

> 兩程伊川後第二十代嫡孫宗孟自襲職回，無他可能，惟以讀書為事。一日讀《河南先公伊川譜》，從吾輩推而上之，世系至先公秀而止；讀《新安統宗譜》，從秀公而推上之，世系至先公元譚止；讀《河南程氏譜》，從元譚推而上之，世系至先公皇帝止。三譜中間雖皇帝一脈分派，譜不同帙，而脈不相連，知者以為譜名雖異而遠宗則一，不知者以為知此而失宗也，吾深為誤焉。遂聯三合一，照依舊規，次第編錄。自皇帝而孕生元譚，自元譚而孕生秀公，自秀公而孕生吾輩，上有所統，此一本而統乎萬殊。有吾輩而上宗秀公、有秀公而上宗元譚、有元譚而上宗黃帝，是下有所宗，此萬殊而歸於一本，名為《河南程氏正宗世系》。是圖落成，不惟一見吾程氏正派流長之盛，且俾為者不得以肆其辭焉。是為序。

49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41。

50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33。

時隆慶壬申歲伊川二十代嫡孫宗孟編錄[51]

從序的內容看，序文作者也是修譜者，他看到了自己家族以外的三部有關程姓的族譜。序中還說作者是二程的「嫡孫」並「襲職」，似乎作者是中國人。如果不錯的話，該序收入朝鮮的族譜，說明當時朝鮮程姓與中國程氏的交往較多，他們修譜得以借鑒中國的族譜。河南程氏〈正宗世系譜序〉作者程宗孟也是修譜者，他看到了自己家族以外的三部有關程姓的族譜。該序說明當時朝鮮修譜借鑒了中國族譜。

十六世紀的族譜仍多借助身為地方官的族人刊刻。安瑋作於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朝鮮明宗元年）〈順興安氏譜序〉記載：

> 氏族有譜尚矣，無譜無以知祖先之所自出，子孫寢以乖隔，或不識緦麻之親，視同路人，不待親盡服盡而後疏且遠也。我順興安氏家傳孝友，世守詩禮，圭組蟬聯，將三百年於茲，而譜未修焉。舍弟琚勤搜博訪，手自撰錄。後得族兄縣監珽氏所撰譜牒，將刊行，而丙午春按節嶺南。宣化之餘，邀生員承宗並集其所藏舊牒及他譜，使掌證訛，因囑安東府使成公，謹募工入梓，二君皆安氏內外孫也。[52]

可知順興安氏內外子孫修譜，後孫安東府使成公又募工刊行。與安東權氏類似，安氏也刊行於安東府，該事例再次證明安東府刊行並不是因公的官刻，只不過是擔任安東府的官員進行本族事務而已。此次修譜有多名身為官員的子孫參與其事，序中列出「同任」修譜者有二十二人之多，還有四人「助其役」。[53]說明修譜是內外子孫的大事，該族是有眾多官

51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59~60。

52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46~47。

53 該序接著說：「於是子孫之同任是道者，若兵使金公舜臯、水使宋公軫、都事鄭君浚、尚州牧使鄭侯希弘、金海府使權候琰、青松府使李侯敬長、密陽府使金侯彭齡、大邱府使黃侯世獻、醴泉郡守金君泓、永川郡守李君仲梁、豐基郡守柳君敬長、金山郡守沈君希源、咸安郡守柳君世龜、清道郡守金君希稷、梁山郡守黃君怡、義城縣令張君世沈、龍宮縣監金君雨、軍威縣監許君慎彥、陽縣監李君秀枝、比安縣監柳君伏龍、仁同縣監趙君庭筠、機張縣監全君琛，有如沙斤察訪柳君用恭、昌樂察訪金君萬鎰、金泉察訪權君東弼、黃山察訪李君翔相與助其役焉。」可知該族的地方勢力強大，具有朝鮮社會的兩班宦族性質。

員族人的有勢力宗族。

文化柳氏嘉靖四十四年（1565）所刊譜充分顯示了士大夫的力量和外家的支援，結合譜後的捐助刊譜名單來看，在慶尚監司李友閔、全羅道監司南宮忱、忠清道監司柳濬率領下，該三道任官者一百九十一名出了刻印世譜的費用。之所以如此勞師動眾是因為該譜規模大，費用多，不像柳氏的八寸譜，由柳希濬獨自完成。這樣看來，文化柳氏嘉靖譜與更早的安東權氏成化譜，這些多少借助官府刊刻的較大規模族譜，主要是為了解決刻印費用問題。除了安東權氏成化譜、文化柳氏嘉靖譜這兩部數一數二的族譜外，當時還有「內外八寸之譜」被刊行。

青松沈氏在十六世紀前三次修譜，都是由該族作為地方官的族人刊刻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沈通源任職於順天府（順天都護府使順天鎮兵馬僉節制使兼監牧），於此刊刻了本族族譜。沈銓身為全州府尹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續修並刊行了族譜。萬曆六年（1578）沈氏再此續譜，沈義謙時為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刻印族譜的費用是在全羅道的官員「咸出錢以助其費用不貲」而完成的。身為地方官刊刻族譜，顯然可以利用政治資源。它可以使族譜具有官府支援的象徵意義以及官府提供的一些條件，如募工、存版等。安東金氏萬曆八年（1580）新譜也是由江華府使金鋘自為忠清道節度使時，「購工刊出」，可能也與地方官的身份有關。陰城朴氏族譜的刊印是「鳩功捐俸」而成，表現出依靠官僚的屬性。

十六世紀發生的壬辰之亂，既嚴重毀壞了原有的族譜，又刺激了宗族重新修譜。萬曆二十二年（1594，朝鮮宣祖二十五年）金緯所作〈茂長金氏譜序〉，[54]表現出該族的憂患意識，茂長金氏由於禍亂所迫而移居，先是躲避「己卯六臣之禍」分為兩支，修譜與作序的時代又值「壬辰大難」，族尊擔心「將有派系不傳之慮」，於是由金緯「略述家乘」，以「承先保宗」，「厚本裕後」。因此，可以說面臨患難是宗族增強凝聚力的動因之一，修譜也是保族意識的產物。〈茂長金氏譜序〉作為最早記錄壬辰之亂與修譜關係的文獻是值得重視的。前引恩津宋氏也因壬

54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62~63。

辰之亂使宋氏世譜「倉卒泯沒於兵燹之中」，作者所序之譜只是後來新修的簡譜。而光山卓氏新譜由始祖光山君十六世孫卓世英，「慨然有以考據兵火前家牒暨科譜，釐其錯謬，補其殘漏，可謂明於譜矣。」[55]可見光山卓氏新譜於壬辰亂後所修，大約收錄十五、六世的族人。

六、結語

筆者依據現存十五世紀朝鮮的十一篇族譜序跋，對十五世紀的朝鮮族譜形態進行了考察。指出朝鮮族譜是高麗時期修譜的繼續；現存最早的朝鮮族譜序言，是海州吳先敬一四〇一年所作，吳氏所修世系圖也可能是目前所知朝鮮時期最早的族譜；十五世紀修譜已經比較普遍；十五世紀族譜的形式是「內外譜」；朝鮮族譜的修譜思想來自於中國儒家特別是宋儒的主張；譜序作者多為本族士大夫；修譜多為大姓望族，譜書成為宣傳家世的資料；《權氏成化譜》以前的《水原白氏世譜》作為私刻就有可能已經刊刻，官府刊刻族譜大概不能作為當時朝鮮族譜的一般特點。[56]我們通過本文的論述，看到十六世紀的朝鮮族譜主要是記載內外的八寸譜，基本保留民族傳統，十六世紀的朝鮮族譜同十五世紀朝鮮族譜一樣，在朝鮮族譜編纂史上屬於早期階段。由於現存十六世紀朝鮮族譜譜序數量較多，使我們更全面地瞭解了朝鮮早期族譜的面貌。

但是，十六世紀的朝鮮族譜在編撰思想、體例內容等方面較之十五世紀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變化。如譜序反映出朝鮮修譜的政治性在強化，士大夫對於族譜的需要在加強，有人把修譜作為有補於「世教」的教化行為來認識。蘇洵所倡導的修譜看法仍受到重視，但張載等宋儒的主張也被引用，注意更全面地把握宋儒的宗族理論。從族譜編纂過程來看，顯示出從家牒到八寸譜以至更大規模族譜的趨勢，族譜的規模擴大，內容豐富。文化柳氏修譜經歷了從「家傳小牒」到「內外八寸之譜」

55 《韓國族譜舊譜序集》，71。

56 常建華，〈十五世紀朝鮮的族譜〉，見同氏，《朝鮮族譜研究》，第1章，未正式出版。

再到更大族譜三個階段，族譜內容豐富以及體例完善，成為十六世紀朝鮮族譜的代表。十六世紀還產生了譜學家鄭昆壽，這也是譜學受到重視並得到發展的證明。十六世紀晚期，朝鮮族譜受父系宗法觀念的影響，世系記載發生了重要變化。上述新變化預示出朝鮮族譜開始改變傳統，在不斷成熟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接受了中國族譜學的影響，一五九二年發生的長達七年的壬辰倭亂使朝鮮族譜遭到重創，在接下去的十七世紀裏，朝鮮族譜的變化加快，進入了朝鮮族譜編纂史的中期。

Genealogies of the *Chosen* Dynasty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ang, Jian-hua*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alogies of the *Chosen* dynasty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as follows. Firstly, the principles,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genealogies differed from genealogi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due to strengthened political content. The theories of Song Confucians about the genealogies were taken seriously and comprehensively, so Zhang Zai's idea of compiling genealogies was thought of highly while Su Xun's thought is still popular. Secondly, as for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genealogies, there was a change in tendency from *jiadie* to *liu-cun-pu*. Thirdly, the best genealogy with abundant content and perfect form was *Jiajing wenhua liushi shipu* (The Genealogy of the Liu Clan from Wenhua County during Jiajin perio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ile the most famous scholar of genealogy was Zheng Kunshou. Fourthly, while the genealogy were still presented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ms,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became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astly, the Japanese invasion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destroyed the old genealogies; however, this stimulated the recompiling activities.

Keywords: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enealogies of *Chosen* dynasty, the preface of genealogies, the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genealogies, the compiling activities of genealogies.

（責任編輯：李國生　校對：鄭坤騰　陳徵宗）

*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